

政治課責與選民投票行爲 —以 2014 年高雄氣爆事件爲例

游清鑫、蔡宗漢、林長志

國立政治大學

摘要

透過選舉表達民意是當代民主重要的運作原則之一，此一過程也體現了政治課責之價值。然而，選舉時選民可能無法客觀地確認哪些人是需要爲錯誤負起責任，且其它與政治表現沒有直接關聯的因素也可能影響選民對政治人物表現的判斷，使民主理論所主張選民可以透過選舉淘汰表現不好的政治人物的想像，無法在具體經驗中被驗證。事實上，政治課責的實踐與民主治理的好壞息息相關，在臺灣走向成熟民主國家的過程中，此一課題顯得更加重要。本文以 2014 年 11 月底的高雄市氣爆事件爲研究對象，藉由政治課責的理論觀點，瞭解高雄市選民對該事件責任歸屬的認知，以及這樣的認知如何影響其市長選舉的投票行爲。本文發現高雄市選民在該年的市長選舉中，其投票決定固然仍舊受到諸如政黨認同與施政表現等傳統因素的影響，但是選民對氣爆事件的責任歸屬也對其投票決定具有影響力。此一結果也透露出，相較於選民長期心理與情感取向的政黨認同因素，以及選民可能依據模糊資訊所致的政府施政評估因素，具有選民感受程度深、注意程度高以及時間接近選舉時程的氣爆事件，更能直接檢驗政治課責在選舉過程中的作用。

關鍵詞：政治課責、投票行爲、施政表現、氣爆事件、2014 年高雄市長選舉

游清鑫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 台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興趣包含比較政治、選舉制度、政黨與選舉、政治參與、民主化理論與研究設計方法論。

蔡宗漢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 台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興趣爲政治學方法論、比較政治制度與比較政治經濟學。

林長志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兼任助理教授，研究興趣爲比較政治、選舉制度與政黨政治、選民投票行爲、民意調查研究。

(收件：2017/10/17；修改：2018/1/22；接受：2018/3/22)

壹、前言

主流的選舉研究文獻持續強調選民自我認同、兩岸統獨立場的偏好，以及政黨認同因素等，是影響臺灣選民投票決定的主要因素；相對上來講，有關政府施政表現如何影響選民投票的問題，其結論並不一致。然而，文獻上對於政府施政表現如何影響選民投票缺乏一致性的觀點，並不會因而否定其重要性，反而點出了進一步深入探索的必要性。一方面，政府施政表現在重要的政治發展階段具有無可否認的影響力，例如第一次政黨輪替的2000年總統選舉，內部分裂固然是長期執政的國民黨敗選的因素之一，而該時期普受詬病的「黑金政治」也對國民黨的選舉造成不利影響；同樣的，民進黨籍陳水扁總統及其親近人員的貪污問題，也是導致民進黨在2008年總統選舉時失去政權的重要原因；而國民黨籍的前總統馬英九在第二任期間的施政受到民眾嚴厲批判，也讓民進黨在2016年有更好的機會取而代之。另一方面，過度集中於意識型態與認同等面向的政黨競爭不利臺灣邁向更為成熟的民主，觀諸西方成熟民主國家政黨輪替的經驗，可以發現執政者的表現好壞通常扮演關鍵性地位，而這樣的政治樣態也是責任政治的表現。對臺灣來講，現階段政治發展的重點已經不是如何根絕威權體制的弊病，而在於經過幾次政黨輪替之後，如何讓政黨以更負責的政策競爭與施政表現贏得人民的支持，儘快提升民主治理的新階段。

強調以政府表現作為選民投票支持依據的觀點也是民主政治強調政治課責的重要原則。眾所周知地，跟其他政府體制比起來，民主體制所強調的並不是政府政策是否具有最高效率，而是強調政府政策的良窳必須以民眾的評斷為依歸，當政府施政不孚眾望時，民眾便可以透過選舉機制進行懲罰，使現任者在選舉中失利、甚至輸掉政權；而如果民眾認為現任者的表現令其滿意時，也應該有利現任者在選舉中獲利，增加繼續執政的機會。由於政治課責在國內的研究仍屬起步階段，有關臺灣民眾對於政府責任歸屬的研究並不多，而在2014年7月底高雄市所發生的一場氣爆事件，造成民眾鉅大生命與財產損失，不僅

深刻衝擊高雄市民的心理感受，也受到全國民眾的高度關注。該事件也提供一個研究政治課責的機會，讓研究者可以探索民眾對該事件的責任歸屬以及政府處理的表現評估，是否會影響其在市長選舉的投票意向。

本文以下先簡要討論政治課責的相關理論，以及選民評估政府施政的相關問題，並透過問卷調查了解高雄市民對氣爆事件的責任歸屬，探索高雄市民的課責觀以及對政府施政表現的評價如何影響其在市長選舉中的投票決定，過程中也納入其他非課責因素，如政黨認同與選民個人的基本資料進行分析，最後也將依據個案分析結果，於結論部分進行總結與提出本主題未來研究方向的建議。^①

貳、政治課責之研究

就一個民主體制下的政治領袖來講，如果要持續保有政治職位便須要隨時滿足民眾的各項期待，如同學者 Key (1966:10) 所指稱的：「對於失去人民支持的恐懼強而有力地規範了政府的行動」(the fear of loss of popular support powerfully disciplines the actions of government)，當政府或政治人物時刻想著如何藉由人民滿意的施政表現，避免在下次選舉失去人民的支持時，此一過程便產生了人民對政治人物的課責關係。所以，爲了要持續取得人民的支持，政治人物必須向人民說明其決策的理由，尤其當人民對其作爲有所質疑時更是如此，而如果人民覺得政治人物的決策不當，政治人物也必須因而受到處罰 (Schedler, 1999:17)。然而，政治課責的出現固然是民主政治運作的重要項目，但是，學術界對政治課責的研究並沒有一致的面貌 (Mainwaring and Welna,

^① 本文雖以高雄市民在 2014 年市長選舉投票意向爲分析對象，但分析的重點不在理出影響選民投票決定的各種重要因素，而是藉由該次選舉聚焦於探索政治課責因素在選民投票過程中的影響力，因此，重點在政治課責與投票決定兩者之間的關係，而非對選民的投票決定提出完整的解釋。

2003; Schmitter, 2004)。綜觀學者對政治課責內涵的討論，主要集中在討論政治課責的來源(sources)、強度(strength)、方向(direction)以及適用的標的(objects)等面向(Schedler, 1999; Cheibub and Przeworski, 1999; Scott, 2000; O'Donnell, 2003; Gormley and Balla, 2004; Schmitter, 2004; Grant and Keohane, 2005; Hellwig and Samuels, 2007; Kayser and Peress, 2012)。

政治課責的來源通常有來自內部的課責，例如官僚體系對於官員表現的評鑑系統，亦有來自外部的課責，例如司法體系對於政府官員的監督，或是更常見的一般民眾透過選舉對政治人物表現評價的課責行為。課責強度指涉的是課責之後所提供的獎懲程度，政府官員可以藉由良好表現而受到升遷或加薪等獎賞，但如果表現不好則可能受到降級甚至開除的處分，而對執政黨來講，民眾對其表現評價高時，有利其繼續執政，評價低時，則可能在選舉中失利甚至失去政權。而常見的課責方向則有水平課責與垂直課責兩種，前者常以政府機關之間彼此的權力制衡關係為主，例如民主憲政下立法、行政與司法三者之間相互的權力制衡；後者有時強調一個上對下的權力關係，例如行政首長對其政府官員的課責，有時則是選民由下而上地藉由選舉將表現不佳的政治人物趕下台或是促成政權轉移等，都屬於典型的垂直課責。而課責標的則是指受到課責的對象，在政府部門則是所有包含民選與非民選的政府官員，經過課責後這些官員的地位隨之改變，其中最具影響的則是對民選領袖的課責，如果因為表現不佳而遭選民淘汰，將造成整個政府的變動。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政治課責的來源、方向、強度與標的都是研究政治課責的內涵，但實際討論中並無法將這些內涵單獨討論，因為課責的出現會同時包含多重內涵，例如對政府官員的課責可以是來自政府內部、由上而下的課責，但同時也可能有來自司法部門的水平課責，或是來自外部選民由下而上的在選舉中進行課責。同時，由於這些不同內涵的組合，在最高行政首長選舉所產生的政治課責結果也並不一定會造成政府的轉換，而是出現執政黨在議會中席次的減少，或是在其他層級選舉失利等。

從理論適用的角度來看，多數政治課責的研究從「委託人—代理人」

(principal-agent) 的觀點出發，強調選民將其參與政府決策的權力委託給民選官員，民選官員成為選民的代理人執行各項政府職務 (Ferejohn, 1986, 1999; Gailmard, 2014; 蔡宗漢、游清鑫, 2016)。其間重要的關鍵點是當代理人接受委託人的委託時，其行為必須可以隨時受到委託人的評估，委託人依據這些評估結果來決定是要給代理人獎勵或者懲罰，並透過選舉來進行獎懲結果，如果代理人的表現令委託人滿意，則委託人將持續維持與代理人的關係，意即透過選舉繼續支持代理人在位；或者如果不滿意代理人的表現時，委託人即在選舉中支持其他的代理人來行使其權力。此時，選舉與政治課責的實踐是密不可分的，定期選舉的舉行不僅提供選民評估政治人物過去表現的機會，也讓政治人物有機會向選民提供各項施政資訊與成果，因此，每一次的選舉之後，不論是原有政黨繼續執政，或是造成政權轉移，其結果也被視為政治課責的體現。

在經驗研究上，即便是沒有討論政治課責的主題，經常可以看到研究者將選民對現任者的表現評估視為選舉的重要因素，當現任者有令人滿意的表現時，將更有利其選舉命運 (黃秀端, 1994; 吳重禮、李世宏, 2003, 2004; 張傳賢、張佑宗, 2006; 蕭怡靖、游清鑫, 2008; 蕭怡靖、黃紀, 2011; 俞振華, 2012)。而現階段國內學者透過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TEDS) 與亞洲民主動態研究 (Asian Barometer Survey, ABS) 兩大資料庫中，也可以看到多樣與選舉課責相似的操作化定義，內容包含了政府的整體施政表現的評價、政府各部門 (政府機構) 的表現評價、政治人物的表現、政黨表現、特定議題的表現評價、總體經濟表現評價以及個人經濟情況的評價等，內容相當多 (游清鑫、林長志, 2014)。

除了這些以政府或政治人物實際表現的課責研究外，也有部分研究傾向測量一般民眾對於課責的觀念或價值主張。例如在張佑宗 (2009) 與蕭怡靖 (2013) 的研究中，除了探索民眾政治課責如何影響其政治態度與行為之外，更進一步就民眾課責觀的建構與操作方法進行探索。張佑宗藉由 ABS 的資料建構出前述 O'Donnell 等學者所提出的水平課責觀與垂直課責觀，並將民眾的

政治傾向歸類成自由民主（民眾同時具有垂直課責與水平課責）、民粹民主（民眾具有垂直課責但缺乏水平課責）、開明專制（民眾具有水平課責但缺乏垂直課責）與傳統威權（民眾同時缺乏垂直課責與水平課責）等四類，並指出雖然多數台灣民眾具有民粹式民主的特質，即普遍認為可以透過選舉實踐課責，但是對於政府機關之間的課責關係並不重視。蕭怡靖的研究也是從前述 Schedler 與 Mainwaring 等人的論述為基礎，將課責種類分成政治課責（政府必須公開回應人民對政策的質疑）、機構課責（政府機構之間的課責關係）與社會課責（媒體與社會團體監督政府施政的必要性）三種，透過電訪資料分析得出台灣民眾在政策回應的政治課責觀要高於社會課責觀，而機構課責觀則相對最低。其結論也指出民眾在選舉時，會以政治課責作為投票抉擇的考量依據，且民眾對於整體民主運作的滿意度高低也會受到政治課責落實程度的影響。

在國外的研究中，現任者在經濟問題上的表現更是研究者普遍用來解釋選舉結果的重要因素，這一部份的研究可以回溯性（retrospective）經濟投票的研究為代表，如同 Ferejohn（1986:7）指稱的，選民會藉由現任者在經濟議題上的表現來決定是否支持該現任者，當經濟表現不錯時，現任者便容易贏得選舉，反之則否。這樣的研究論點也受到其他學者廣為驗證與延伸，從總體與個體的角度進行跨時與跨國的分析，大體上也肯定選民回溯性經濟投票對選舉結果的重要性（Kramer, 1971; Kuklinski and West, 1981; Kiewiet and Rivers, 1984; Lewis-Beck, 1988, 1997; Shaffer and Chressantis, 1991; Lockerbie, 1992; Lanoue, 1994; Monardi, 1994; Svoboda, 1995）。

由於用來說明經濟表現好壞的指標，例如經濟成長率、失業率或是通貨膨脹等，多具有明確的數字意義與容易取得，有利選民在選舉當中可以參考，使得以執政者在經濟議題上的表現作為政治課責研究的操作化依據具有理論簡潔性（theoretical parsimoniousness）的優點，有利進行更多個案與國家的比較研究。但是，以政府表現評價為主的回溯投票，尤其是回溯性經濟投票，在實際的應用上卻存在以下幾點嚴肅的挑戰。

首先，經濟問題有其政治上的重要性，選民也容易以國家的經濟表現作為投票依據，但就政府整體施政的內容而言，選民對政府經濟表現的評估只是其投票決定的依據之一，其他非經濟因素，同樣也會是選民投票決定的依據。而且一般性施政表現的內涵要比經濟表現評估更為廣泛，舉凡政府在各層面的表現，如社會福利、外交、國家安全、環境保護等等都會被納入，政府在這些個別層面的表現，也會提供選民一個綜合性的評價依據，而經濟因素可能只是其中之一，但並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依據。也就是說，選民進行回溯性投票時，在多數的情形下是同時針對多重議題的評估，政府在這些議題上的表現各有長短，此時，影響選民投票的因素變得複雜難測。如果在選舉前又出現突發性議題，如同本文所要討論的氣爆事件，則原有強調過去一段時間政府經濟表現的回溯評估便無法適用。因為選舉前的特殊事件並無現存的歷史資訊可供搜尋，卻可能對即將到來的選舉產生影響，這些問題都是經濟因素無法涵蓋的。

其次，選民容易感受、理解過去一段時間政府表現的好壞，但卻不一定可以將功勞或責任正確地歸屬到執政者身上。換言之，要判斷政府在過去一段時間的表現可能不太困難，但是能否將施政的功過連結到執政者的表現則是另一回事，在許多時候，選民並不清楚政府施政與最後表現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更多時候甚至將與政府施政不相干的事件發展，也視為政府政策的效果，因而錯亂了政府對其政策表現所應擔負的責任界線。例如，國家經濟表現的優劣除了政府政策的效果之外，同時也受到國際經濟因素的影響，當國家的經濟發展遲緩，失業率上升等負面現象出現時，政府固然難辭其咎，但如果同時觀察鄰近國家，或是與其他經濟發展程度相若的國家相比時，卻常可以發現其他國家的經濟負面表現更為嚴重，相較之下，本國的經濟表現則是差強人意，以此來批評政府在經濟上的表現不佳，進而讓政府在下次選舉中落敗，則難免有「錯殺」之嫌。當然，也可能發現本國的經濟雖然不差，但如果與其他條件相當的國家相比時，卻是屬於後段地位，此時如果政府在選舉中仍舊獲得選民的多數支持，則至少在經濟層面的評估上難免有「溢美」之憾。而不論是「錯殺」或「溢

美」，都顯示出在實踐政治課責時，選民對於政府施政表現的評估以及責任歸屬問題經常存在相當高的難度，此種現象也透露出回溯性投票理論的盲點。

第三、如果有一些突然發生的事件，深刻影響人民的生活，此時政府對該突發事件的處理結果也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決定。持平而論，既然有突發事件的出現，就與政府已經規劃好的施政內容沒有直接關係，政府卻仍是責無旁貸地需要儘量減輕該事件對人民權益的傷害，但選民心中並不一定會很客觀地認同突發事件本身所具有的不可預測性，也不一定會很客觀地評估政府對於突發事件的處理表現。與既有的政治認同因素相比，突發事件的影響力可能相對短暫，如果該事件又成爲選舉議題，不論是候選人刻意在選舉中進行操作，或是該事件恰好與選舉時程相接近，這一印象鮮明的突發事件，以及該事件與政府表現的關聯，同樣也會成爲選民投票時的影響因素。

針對前述三項回溯性投票的困境，學界的討論並不算少，而近期 Achen 與 Bartels 的研究更有提出相當完整與直接的說明。兩位學者指出：選民是短視的（myopic），對於經濟成長問題的評估幾乎都是集中在每一次選舉之前的幾個月，而非執政者在任期內的所有表現（Achen and Bartels, 2016:16）；選民對於政府責任歸屬更容易受到非執政因素的影響，例如經濟困境可能來自全球的金融危機，或是社會不安可能來自突發事件，因此，諸如水旱災的發生或是海岸發生鯊魚攻擊事件等，選民都可能將這些問題歸咎於當時的執政者，造成執政者在選舉中失利，而選民在選舉過程中的回溯評估則是一種「盲目回溯」（blind retrospection）（Achen and Bartels, 2016:116-35）。亦即 Achen 與 Bartels 並不否認選民會透過回溯性的思考評估政府表現，也認爲這樣的表現評估仍舊會影響其投票決定，只是最後的結果可能是選民因爲資訊不明而盲目課責。

值得注意的，雖然 Achen 與 Bartels 強調選民對水旱災與鯊魚攻擊事件的責任歸屬模糊，導致最後選舉結果不利於現任者，是來自於事後投票結果的分析與推論，但並沒有進一步討論選舉期間不同陣營的候選人對該事件的立場與互動情形。事實上，突發事件不像常規的競選活動可以事前規劃，其結果必然

會對最後的選舉帶來不確定性，而且如果該事件對民眾的權益造成重大影響，自然會受到民眾極大的關切。在此情形下，在野的挑戰者會視該突發事件為攫取更大選舉利益的機會，常見的狀況是一方面關切事件的受害人，一方面追究現任者的責任，將整體事件導向執政者的無能。相較於此，突發事件向來是執政者所不樂見，也容易造成政治上的損失，2011年3月11日發生於日本福島的地震以及隨後而來的海嘯與核災，致命地衝擊了當時執政的日本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DPJ）的治理能力與執政地位。

但是，突發事件也不必然地都會對執政者造成不利的選舉影響。事實上，面對突發災難的出現，掌握最多資源的執政者站在處理災難的第一線，如能發揮穩定人心與迅速救災的功能，執政者反而可以獲取更高的聲望，例如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遭受恐怖攻擊時，當時紐約市長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的相關反應與作為，即受到紐約市民的普遍肯定；類似的，2016年2月6日肇因高雄美濃地震對台南市所造成的維冠大樓倒塌與上百人死亡的意外，也讓時任台南市長的賴清德因為盡心救災與慰藉人心而提高其聲望。近期王文誠（2016）以災難政治學的觀點出發，說明高雄市長陳菊藉由中央與地方政治鬥爭之尺度政治（politics of scales）與不均地理發展的策略應用，讓地方的氣爆事件成功地轉化焦點為中央政府長期南北產業發展策略設計不良，並沖淡高雄市作為氣爆事件究責對象的身份，最終促成陳菊得以大幅度領先挑戰者而連任成功。該文是少數從政治（鬥爭）的角度討論高雄氣爆事件的研究，提供諸多高雄市政府如何配合不同的時間點提出氣爆事件責任的論述，讓陳菊市長得以化危機為轉機，除了理論的應用之外，也對氣爆事件提供相當有用的資訊參考。

參、氣爆事件與研究設計

一、氣爆事件

在 2014 年 7 月 31 日晚間 8 點左右，位於高雄市凱旋三路與二聖一路上的
人孔蓋忽然向上爆衝，隨即帶出濃厚瓦斯氣味的白煙，約莫三個小時之後，附
近區域陸陸續續出現帶有強大火焰的多次爆炸，除了導致附近大規模的道路與
房屋損害、斷電、斷水之外，更不幸地造成超過 30 名市民死亡、300 名市民受
傷之悲劇。^② 此一意外事件隨即引來媒體與全國各界的密切關注，高雄市政府
與中央政府也隨即展開大規模的救援行動。除了後續的救災行動，包含高市在
內的全國民眾，也隨著媒體的密切報導，開始對中央政府以及高雄市政府在此
事件的回應方式有了不同的觀感。一方面，報導指出高雄市政府官員在第一次
爆炸時即接獲消息，但卻沒有有效地採取回應措施，而高雄市的反對黨議員（國
民黨議員）也控訴民進黨的市長陳菊在此事件上的疏失。但另一方面，執政黨
議員（民進黨議員）則指控曾任市長的吳敦義（國民黨籍）應該為其任內有關
瓦斯管線的設計與埋設不良、並進而造成此次爆炸負責。在此同時，社會各界
排山倒海而來的批判與究責，也迫使一些與此事件直接相關的政府官員快速去
職，包含中央層級的經濟部次長以及地方高雄市政府的副市長、水資源局局長、
公共工程局主任以及高雄市捷運局局長等，且司法單位也隨即介入，追究與此
意外事件關係密切的李長榮化工公司。

不論是司法責任的追究，或是政治責任的歸屬，都並非在短時間內便可以
有一個明確的結果。然而，隨著 2014 年高雄巿市長與市議員選舉的逼近，此
一事件格外地具有政治重要性。氣爆事件距離 11 月 29 日的市長與市議員選舉
不到四個月，在野的國民黨當然會使用各種可用的手段抨擊高雄巿政府嚴重失

^② 有關傷亡人數在媒體之間有不同的說法，如以本事件三週年之後的報導來講，該事件最後造成 32 人死亡、321 人受傷。但不論媒體對最終傷亡人數的差異，該事件造成重大人命與財產損失則是毋庸置疑。見蘋果日報（2014）、林伯驊（2018）、維基百科（2018）。

職，並且應該為氣爆事件負起全責。但執政的民進黨則試圖將氣爆事件解讀成在中央執政的國民黨長期忽視高雄市的公共安全問題，並且在高雄地區不當地發展具污染與危險的化工產業（王文誠，2016）。另一個中央與地方的角力點則是當時陳菊市長一再地向中央政府呼籲儘快提供足夠的資金協助高雄市進行救災與重建，但此要求並不順利，當時的行政院院長江宜樺雖然重申全力救災迫切性之外，對陳菊市長的鉅額財務救援無法全數回應，也讓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救災重點上有所出入。

本文研究目的並非想要討論究竟哪一方需要對氣爆事件負責，或是應該有多少的法律責任，而在於藉由此一突發事件，探索高雄市選民的課責認知如何影響該年底的高雄市長選舉。就課責研究的角度來講，氣爆事件對高雄市，甚至於全國地區來講，都是 2014 年地方選舉的重大事件，選定該事件進行研究，將有助於避開前述政治課責研究文獻所點出的兩個重要問題。第一，可避免選民進行回溯投票時，對政府施政或是重大政治事件可能存在資訊與理解程度不足的問題。氣爆事件對於高雄市民來講，資訊應已經相對充分。不論是損害問題、救災問題，高雄市政府首長以及中央官員對此事件的發言等，在該事件發生之後，幾乎佔據了與高雄市相關的所有新聞版面，並且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在此情形下，可以減輕選民對該事件認知性不足的問題。第二則是可避免選民因時間拉長導致記憶模糊的限制，從事件發生到高雄市長選舉不到四個月的時間，兩者時間相距並不長，且這期間持續出現的新聞報導並不少，如此可以讓高雄市選民在市長選舉時仍舊有相當的記憶，有助於選民以該事件評斷政府責任，並進而在選舉中進行課責。^③

^③ 本文主要關切點在民眾如何評價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氣爆後的作為，以及這樣的評價是否會因此影響其投票抉擇。至於民眾對該事件的注意程度，主要是說明氣爆事件對高雄市民眾來講並不陌生，而民眾所持有的資訊是否正確，則需要更多時間與資訊的呈現才能回答，這兩者如何影響民眾對兩造政府的善後處理評價，以及最後的市長投票抉擇，理應是另一個研究問題，限於理論興趣與本文篇幅，本文並沒有從此方向進行討論，而直接聚焦於民眾所認知的處理評價與投票之間的關聯性。

換言之，在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相互角力的過程中，由於媒體的相關報導，選民對於整體氣爆發展應有相當程度的掌握。本文並不強調選民資訊的正確與否，而且就算選民對氣爆事件相對有比較多的認知時，其資訊來源也不一定就是最終最正確的資訊，因為進行電話調查時，有關氣爆事件的司法責任歸屬，與相關的賠償問題都還沒有完成。所以，本文藉由與投票日期相近，與選民就其自我所遭遇與認定的各種資訊，作為評估前述兩造政府的處理方式，以及這樣評估與市長投票選舉的關聯性。此外，以此重大事件作為政治課責的研究，也有別於多數以政府整體表現，或是在經濟方面的施政表現作為課責依據的研究。相較之下，對選民的感受而言，此事件要比政府的整體施政或是經濟表現更為具體與直接，尤其是對高雄市選民應有更強的感受，透過選民對此事件的主觀究責與對政府施政表現的評價兩者相互比較，將更有助於政治課責的完整研究。

二、資料來源、研究問題與變數設計

基於前述研究文獻的討論，本文嘗試透過氣爆事件的剖析，以 2014 年高雄市長選舉為例，檢驗民眾對氣爆事件責任歸屬與其投票決定之間的關連性。使用資料係採自行政院科技部資助之《政治課責—制度設計、選民資訊與投票行為》研究計畫（計畫編號：NSC102-2410-H-004-131-MY3），該計畫係由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所執行，計畫主持人為游清鑫教授。該研究案係以電話訪問蒐集資料，調查母體為設籍高雄市年滿 20 歲及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訪問時從中華電信住宅電話簿抽取電話號碼，依據所有的區域號碼之帶頭碼組合（prefix）與電腦隨機產生亂數做為後 2 碼，構成完整電話號碼抽樣清冊，以隨機撥號抽樣方法（Random Digit Dialing, RDD）選出訪問家戶，執行電訪時，訪員於電話接通後，按照戶中抽樣的原則，抽出應受訪的對象進行訪問，訪問期間自 2015 年 1 月 21 日至 1 月 25 日，訪問完成 1,143 個有效樣本，以 95% 之信心水準估計，最大可能隨機抽樣誤差為：±2.89%。

在主要的變數設計上，被解釋的變數是選民投票對象。在該年高雄市長選舉當中，主要候選人有尋求連任的民進黨陳菊市長，以及代表國民黨參選的楊秋興，另有無黨籍的周可盛共三位候選人，而實際選舉結果是陳菊以 68.1% 得票率贏得連任，主要的挑戰者楊秋興得票約為將近 30.9%，而另一位挑戰者周可盛得票率僅有 1% 左右，由於周可盛的得票比率並不高，因此在本文的分析中，僅包含投票給兩大政黨候選人陳菊與楊秋興兩人，周可盛的得票率與其支持者並不納入分析。

在解釋變數上，主要是以民眾在氣爆事件相關問題上的認知為主，包含氣爆責任歸屬認知、中央政府處理氣爆滿意度，與高雄市政府處理氣爆滿意度三項。首先，藉著本次氣爆事件的出現與後續地方與中央政府相互攻訐，本文設計出民眾對該事件的課責觀，測量民眾對氣爆事件政府責任歸屬的認知。此課責觀不僅非常聚焦地以此次氣爆的過程為對象，探索民眾究竟認為是中央政府或高雄市政府應該對此事件負起比較多的責任，同時也更有可能將此種責任歸屬連結至選民在市長選舉的投票決定，意即當民眾認為高雄市政府應當對氣爆事件負起較多責任時，在市長選舉中會因為究責之故，傾向投票給挑戰者，反之，則繼續投票給現任者。問卷內容為：「請問您認為這次氣爆的發生，是中央政府還是高雄市政府應該負比較大的責任？」選項是以具有強度遞移的 Likert 尺度呈現：「中央政府負全部的責任」、「中央政府負大部分責任」、「高雄市政府負大部分責任」、與「高雄市政府負全部的責任」。但在實際訪問過程中，受訪者的回答有出現這四個既定的選項以外的內容，例如受訪者認為高雄市政府與中央政府的責任是「一半一半」、或是「都有」、或是「李長榮公司」（本次氣爆管線所屬公司）等，這些選項在最後模型分析時，依其意涵分別被重新歸類到「中央政府負大部分責任」、「高雄市政府負大部分責任」，或是「無反應」的選項中。

其次，在氣爆發生之後，高雄市政府以及中央政府儘管對責任歸屬有所爭執，但後續的救災與重建工作仍持續進行，兩造政府在這些善後工作的表現，

本質上也是民眾判斷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據，也會對緊接而來的市長選舉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因此，在前述責任歸屬變數之外，本文也針對民眾分別對於中央或地方兩造政府的表現評估進行了解，並假定當民眾滿意高雄市政府對氣爆事件的處理方式時，會傾向在市長選舉中繼續投票支持尋求連任的陳菊；但是如果民眾對中央政府處理氣爆事件的方式感到滿意時，會傾向在市長選舉中，投票支持挑戰者楊秋興。兩道題目的問卷內容分別為：「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高雄市政府處理氣爆的表現滿不滿意？」與「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中央政府處理氣爆的表現滿不滿意？」選項的呈現也是以常見具有強度遞移的 Likert 測量方式呈現：「非常滿意」、「有點滿意」、「不太滿意」與「非常不滿意」。

除了前述與氣爆事件緊密相關的三個問題之外，本文同時也依循既有政治課責研究常用的施政滿意度評估，設計選民回溯評估施政表現的問題，包含了民眾對高雄市政府、中央政府在過去施政表現以及現任市長的施政表現評估，從中理解在 2014 年高雄市長選舉當中，民眾的施政滿意度如何扮演政治課責的機制，是否當選民認為高雄市過去的施政表現令人滿意時，將繼續支持現任者，反之則支持挑戰者；而當民眾滿意現任市長的表現時，也會持續將選票支持尋求連任的現任市長，反之則投票給挑戰者。前述各變數具體的問卷內容以及變數值的編碼方式，可參閱本文附錄一的內容。最後，在投票行為研究常見的政黨認同因素，以及選民基本的社會特徵因素，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在台灣的選舉當中具有重要性，本文也將一併納入分析中，但由於這些因素已經有相當多的討論，在此不再進一步贅述其與投票決定之間的關聯性。

肆、資料分析

在資料分析部分，本文主要採取兩個階段來進行，第一階段主要是以描述性分析討論前述核心問題，包含：投票支持對象、氣爆責任歸屬、氣爆處理評價以及施政評價等。第二階段則是以這些問題再納入當前選舉研究常用的政黨

認同、性別、年齡與教育程度等社會人口變數，進行二元邏輯斯迴歸（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

有關民眾投票意向部分，如表一所示，有五成一的受訪者表示投票支持尋求連任的陳菊，只有一成一的受訪者表示其將選票投給挑戰者楊秋興。如同許多調查結果一樣，受訪者所反映出的投票意向分布與實際的選舉結果有不小的出入，主要原因可能在於選民遺忘，或是不願意告知調查單位真正的投票決定等，本次的調查結果有高達三成七以上的受訪者對投票對象的回答是「其他」，即可能是這樣受訪者此種心態或狀況的反映。^④

在氣爆事件的注意程度方面，本問題主要是在檢驗該氣爆的發生，與事後的發展，能否讓高雄市民共所矚目，調查結果顯示有超過三成的受訪者表示「非常注意」氣爆事件，其次是有超過四成三的受訪者表示「有點注意」氣爆事件，另外分別有兩成左右與 2.8% 的受訪者表示對氣爆事件「不太注意」與「非常不注意」，此外尚有 3.5% 的受訪者對此問題無反應。此一結果顯示氣爆事件的確是高雄市民在選舉期間相當關注的意外事件，如果將「非常不注意」與無反應兩者的比例一併思考，則只有不到 6% 受訪者對此事件沒有任何感受，也相當程度說明以該事件作為本文分析個案的適當性。

有關氣爆責任的歸屬問題，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受訪者是抱持著中央政府與高雄市政府都須要負起相當責任的看法，而將事件責任全數歸咎中央政府或是高雄市政府的受訪者相對較少。更具體而言，有三成七左右的受訪者認為

^④ 訪問結果顯示受訪者有低度回答的傾向，且對選舉落敗的楊秋興（其實際得票率約為 31% 左右）的低度回答要比對贏得選舉的陳菊（實際得票率約為 68.1%）更為明顯，透露出電訪調查數據與實際選舉結果有明顯差距。同時在受訪者當中分別有 1% 表示無投票權，20.5% 表示沒去投，2.2% 投廢票，以及 13.7% 的受訪者對此問題表示忘了或是拒答，這些受訪者無法直接納入投票決定的分析模型當中。經比較後得知，此結果與 TEDS2014 的面訪調查相似，說明確有高比例的高雄市選民對選後調查不願意回答，這一部分的確造成分析過程中的困難。為求謹慎，本文也嘗試檢驗在這些類型選民的政黨特性、性別、年齡與教育程度特性，其投票選擇也大致上呈現隨機性分布，或者因為類別個數過少而無法判定，因而在分析中，就以楊秋興與陳菊兩人的支持率為主。

表一 選民投票對象與氣爆相關問題態度分布

問卷內容	次數	百分比
市長投票對象		
楊秋興	126	11.0
陳菊	585	51.2
周可盛	4	0.4
其他（無投票權、沒去投、投廢票、無反應*）	428	37.4
氣爆事件注意程度		
非常注意	347	30.3
有點注意	497	43.5
不太注意	232	20.3
非常不注意	32	2.8
無反應	35	3.1
氣爆責任歸屬		
中央政府負全部的責任	117	10.2
中央政府負大部分責任	326	28.5
高雄市政府負大部分責任	424	37.1
高雄市政府負全部的責任	98	8.6
一半一半	21	1.8
都有	32	2.8
李長榮公司（業者）	12	1.1
吳敦義前高雄市	14	1.2
以前的中央政府	2	0.2
以前的高雄市政府	8	0.7
無反應	90	7.9
高雄市政府處理氣爆滿意度		
非常滿意	381	33.4
有點滿意	464	40.6
不太滿意	123	10.7
非常不滿意	78	6.9
無反應	97	8.5

表一 選民投票對象與氣爆相關問題態度分布 (續)

問卷內容	次數	百分比
中央政府處理氣爆滿意度		
非常滿意	40	3.5
有點滿意	192	16.8
不太滿意	380	33.2
非常不滿意	385	33.7
無反應	146	12.8
中央政府施政滿意度		
非常滿意	12	1.0
有點滿意	81	7.1
不太滿意	368	32.2
非常不滿意	597	52.3
無反應	85	7.5
陳菊市長施政滿意度		
非常滿意	429	37.5
有點滿意	494	43.2
不太滿意	107	9.4
非常不滿意	55	4.8
無反應	59	5.1

資料來源：游清鑫（2015）。

說明：* 無反應包括：很難說、無意見、不知道、拒答。

這一事件應該由「高雄市政府負大部分責任」，其次是有超過兩成八的受訪者認為應由「中央政府負大部分責任」，再來是有約一成的受訪者認為「中央政府負全部的責任」，以及最後有 8.6% 的受訪者認為「高雄市政府負全部的責任」，最後則有 7.9% 的受訪者對此問題無反應。此外，受訪者在回答的過程中，也有主動提及一些其他選項，如「一半一半」、「都有」等，但整體比例並不高。

氣爆事件發生後，民眾對中央政府與高雄市政府的後續處理，受訪者分別對兩造政府有不同的評價。有關民眾對高雄市政府的處理觀感部分，絕大多數的受訪者傾向滿意高雄市政府的處理方式，其中，有超過四成的受訪者「有點滿意」高雄市政府的處理方式，接著是有超過三成三的受訪者表示「非常滿意」高雄市政府的處理方式；在另一方面，分別只有略超過一成與 6.9% 的受訪者表示「不太滿意」與「非常不滿意」高雄市政府在氣爆事件的處理方式。相較之下，受訪者對於中央政府的處理方式則多有不滿，其中，同時，分別都有超過三成以上的受訪者對於中央政府在處理氣爆事件的表現「不太滿意」或「非常不滿意」；在正面評價部分，有一成六的受訪者對中央政府處理氣爆事件的方式「有點滿意」，以及 3.5% 的受訪者表示「非常滿意」。整體來講，受訪者不滿中央政府對氣爆事件的處理方式高於不滿高雄市政府對氣爆事件的處理方式，這樣的觀感或許也與當時兩造政府彼此相互指責，以及中央政府對高雄市政府對於投入救災的需求有不同的看法有關。^⑤

再者，就民眾對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過去施政的一般性評價，整體調查結果類似前述有關氣爆問題的處理評價一項，高雄市政府得到多數受訪者的正面肯定，而中央政府則有很高的負面評價。具體而言，有高達五成二的受訪者對中央政府過去的施政表現表示「非常不滿意」，其次是有三成二的受訪者表示「不太滿意」，而表示「有點滿意」與「非常滿意」的受訪者比例偏低，分

^⑤ 針對善後問題的處理上，高雄市政府要求提高救災層級與救災預算，但時任行政院長的江宜樺則表示對於救災行動無須特別立法、無須設立特別機構、以及無須編列特別預算（自由時報，2014）。

別只有 7.1% 與 1.0%。相較之下，有四成三的受訪者表示對陳菊市長過去施政表現感到「有點滿意」，更有超過三成七的受訪者表示「非常滿意」，而感到「不太滿意」與「非常不滿意」的受訪者比例偏低，分別只有 9.4% 與 4.8%。此一結果也與遠見雜誌在 2015 年「縣市長施政滿意度調查」相似，在該調查中高雄市長陳菊的施政滿意度已連續三年獲得五星級最高評價（遠見編輯部，2015）。換言之，儘管氣爆事件的發生，高雄市民對於陳菊市長的表現仍舊有相當高的滿意度。

除了瞭解高雄市民對前述相關問題的態度分布之外，下一個問題便是這些態度分布與市長投票對象之間的關聯性如何？從表二的結果來看，^⑥ 整體結果與原有的研究期待相吻合，即當選民認為責任歸屬在中央政府、對中央政府處理氣爆的方式不滿意以及對中央政府的施政表現不滿意時，都會傾向將選票投給尋求連任的陳菊；相對上，當選民認為高雄市政府應該負起較大責任、不滿意高雄市政府處理氣爆方式、以及不滿意高雄市政府的施政時，相對也會有比較高的比例投票支持挑戰者楊秋興。

前述表二的關聯性分析指出民眾對於政府的各種表現，不論是針對氣爆的責任歸屬、處理方式、或是過去的施政有不同評價時，也都會與其最後的投票決定有密切關係。然而，表二所呈現的僅是個別問題與選民投票意向的關聯分析，例如責任歸屬不同與投票決定不同具有相關性，僅驗證了本文所列舉的幾個研究問題的確與選民投票決定有關。但究竟這些問題是以何種方式來影響選民的投票決定？以及當這些問題同時出現時，個別問題與選民投票決定的原有關聯性是否會改變？

爲了進一步確認前述問題，本文透過二元邏輯斯迴歸分析，先檢定從氣爆問題的影響力、隨後再加上施政滿意度變數、最後再加上政黨認同與其他社會

^⑥ 在關聯性分析的資料處理過程中，考量解釋變數原有四個刻度的 Likert 尺度中，會有部分回答選項由於個數過少而不適合進行卡方檢定，因此，表二中的解釋變數中的選項是將原有四個刻度在簡化成兩個選項來處理。

表二 責任歸屬、處理評價、施政滿意度與投票關聯性

	陳菊	楊秋興	個數	統計值
總體投票對象	82.3%	17.7%	N=711	
責任歸屬				
傾向中央政府	96.5%	3.5%	n=346	n=636, $\chi^2=117.764$, df=1, $p<.001$
傾向高雄市政府	64.8%	35.2%	n=290	
高雄市政府處理滿意度				
不滿意	26.5%	73.5%	n= 98	n=674, $\chi^2=191.114$, df=1, $p<.001$
滿意	92.0%	8.0%	n=576	
中央政府處理滿意度				
不滿意	86.9%	13.1%	n= 512	n=643, $\chi^2=21.944$, df=1, $p<.001$
滿意	68.7%	31.3%	n= 131	
中央政府施政滿意度				
不滿意	85.3%	14.7%	n=633	n=682, $\chi^2=42.350$, df=1, $p<.001$
滿意	42.9%	57.1%	n= 49	
高雄市政府施政滿意度				
不滿意	16.7%	83.3%	n= 84	n=694, $\chi^2=219.225$, df=1, $p<.001$
滿意	92.0%	8.0%	n=610	

資料來源：游清鑫（2015）。

人口變數，得出如表三的三个模型。模型中的被解釋變數即為選民的投票對象，分別為代表民進黨尋求連任的陳菊以及國民黨的挑戰者楊秋興，並以陳菊為觀察組、楊秋興為參考組的方式呈現。至於解釋變數部分，氣爆責任歸屬、氣爆處理評價以及施政評價皆先重新歸成兩類的形式代入模型（如同前述表二方式），並分別以氣爆責任傾向高雄市為觀察組（氣爆責任傾向中央政府為對照組）、滿意高雄市政府處理氣爆方式為觀察組（不滿意高雄市政府處理氣爆方式為對照組）、滿意中央政府處理氣爆方式為觀察組（不滿意中央政府處理氣爆方式為對照組）、滿意中央政府施政表現為觀察組（不滿意中央政府施政表現為對照組）、滿意高雄市政府施政表現為觀察組（不滿意高雄市政府施政表

現為對照組)。政黨認同部分則分成泛藍、泛綠以及中立者三個類型，並以泛綠政黨認同者為對照組，其餘兩類為觀察組。性別以女性為對照組，男性為觀察組。年齡以 20-29 歲為對照組，其餘年齡層為觀察組。教育程度則以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為對照組，其餘教育程度為觀察組。

表三的模式一僅先分析選民對責任歸屬的認知、高雄市政府處理氣爆事件的滿意度、及中央政府處理氣爆事件的滿意度等三個變數如何影響選民的投票決定。結果顯示這三個變數皆顯著地影響選民的投票決定，其中，與那些認為中央政府應該為氣爆事件負起較大責任的受訪者相較之下，認為高雄市政府應該為氣爆事件負起較大責任的受訪者，在選舉中更不傾向投票支持尋求連任的陳菊（即多數傾向將選票支持挑戰者楊秋興）；其次，與不滿意高雄市政府處理氣爆方式的受訪者比較起來，滿意高雄市政府對氣爆事件處理方式的受訪者有很高的傾向在選舉中支持陳菊；再者，相較於那些不滿意中央政府對氣爆事件處理方式的受訪者，對中央政府處理氣爆事件的表現感到滿意的受訪者，有很明顯的傾向沒有在選舉支持陳菊。此一簡化模型顯示氣爆事件的責任歸屬以及後續對中央與地方政府氣爆處理表現的評價，影響了選民在市長選舉中的投票意向。

模型二則進一步納入選民對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整體施政評價。結果一方面持續支持模型一的發現，即責任歸屬、對兩造政府的處理評價持續對選民投票具有顯著影響，並顯示在新加入的施政表現變數上，也呈現與理論預期相符的結果，即相較於不滿意中央政府施政表現的受訪者，滿意中央政府施政表現的受訪者可能出現不支持現任者陳菊，而是支持挑戰者楊秋興；而相較於不滿意高雄市長陳菊施政表現的受訪者，滿意其表現的受訪者非常顯著地會傾向會將選票支持陳菊。模型三再加上受訪者的政黨認同與基本社會人口資料後，分析結果發現與氣爆相關問題的三個變數仍然對選民的投票決定具有影響力，但在滿意中央政府處理氣爆問題上，即使仍有重要性，其顯著程度則稍微減低。而在施政表現評價上，可以發現滿意中央政府施政表現的問題已經不再對選民投

表三 氣爆事件與選民投票決定 (陳菊 = 1 ; 楊秋興 = 0)

	模型一 責任歸屬與處理評價			模型二 責任歸屬、處理評價與施政滿意度			模型三 責任歸屬、處理評價、施政滿意度與其他基本變數		
	B	S.E.	Exp (B)	B	S.E.	Exp (B)	B	S.E.	Exp (B)
截距	.928	.864	2.529	-.579	1.212	.560	.909	2.098	2.481
氣爆責任歸屬地方	-2.002***	.365	.135	-1.925***	.420	.146	-2.153**	.581	.116
滿意市府處理	3.185***	.346	24.164	1.817***	.435	6.152	3.086***	.707	21.900
滿意中央處理	-1.260***	.336	.284	-1.199***	.389	.301	-.992*	.579	.371
滿意中央施政				-.992*	.544	.371	.163	.823	1.177
滿意市長施政				2.721***	.447	15.192	2.441***	.655	11.487
泛藍政黨認同者							-5.171***	.772	.006
中立者							-1.576**	.661	.207
男性							-.360	.458	.698
30-39 歲							-.588	.723	.555
40-49 歲							-.477	.783	.621
50-59 歲							-2.138**	.945	.118
60 歲及以上							-1.593	1.141	.203
國、初中							-2.695**	1.243	.068
高中、職專科							.000	1.026	1.000
大學及以上							.431	1.220	1.538
N							-1.740	1.178	.176
Cox & Snell R ²		.587			.587			.564	
Nagelkerke R ²		.316			.355			.459	
		.525			.607			.788	

資料來源：游清鑫 (2015)。

說明：***: p<0.01; **: p<0.05; *: p<0.1。

票決定具影響力，但對高雄市長滿意與否則仍舊具有重要性。此外，傳統文獻所強調的政黨認同因素，以及受訪者的年齡與教育程度差異，也會影響選民的投票。其中，相較於泛綠政黨的認同者來講，泛藍政黨的認同者或是抱持政黨中立的選民更傾向在選舉中支持挑戰者楊秋興；相較於 20-29 歲的受訪者來講，年齡在 50-59 歲的受訪者更傾向支持挑戰者楊秋興；相較於國小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受訪者來講，國、初中教育程度的受訪者也更傾向支持挑戰者楊秋興。更重要的是，模型三的分析清楚顯示，即使納入政黨認同此一長期心理因素，民眾在此氣爆事件中對政府的「課責」仍然發揮著左右其投票決定的顯著影響。^⑦

伍、結語

Manin、Przeworski 和 Stokes (1999) 在將近 20 年以前即清楚說明政治課責的內涵與主要的實踐方式，此一說明提醒研究者，政治課責雖然在字面上容易令人聯想到「課責」即是具有懲罰性的責任追究，但實質上，課責除了懲罰施政不良的現任者之外，也包含獎勵施政表現令人滿意的現任者。本文以氣爆事件作為課責研究對象，從兩個層次來探索民眾的主觀認知，一是氣爆發生的責任歸屬，二是氣爆處理是否令人滿意。顯然，高雄市選民對第一個問題的意見分布是比較分散的，認為高雄市政府與中央政府對於氣爆事件的發生都有責任，但在第二個問題上，高雄市政府在氣爆發生後的整體回應作為，包含救災、重建、甚至是發言立場等，大體上都得到市民的認同；相較之下，中央政府對災後的處理方式並沒有受到太多市民的認可，此一差異也顯現在最後的投票決

^⑦ 在整體分析中，本文也進一步考量主要變數之間的交互作用可能造成的影響，參考相關研究的方法 (Berry, DeMeritt, and Esarey, 2010; Tsai and Gill, 2013)，經過檢證分析之後，得出結果與本文的理論一致，即選民的責任歸屬認知不會因為是否滿意地方政府處理氣爆事件而有所差異，但會因為是否滿意中央政府處理氣爆事件而有所差異。詳細內容請參閱附錄二。

定，多數滿意高雄市政府對氣爆事件處理方式的選民，在市長選舉時顯著地支持尋求連任的陳菊。

此外，課責研究經常探索的施政表現問題也對選民的投票決定具有影響力，尤其是對高雄市政府施政表現的評估，要比對中央政府施政表現的評估，對選民的投票決定更有影響力。這一差異的來源可能是本文以高雄市長選舉為檢驗依據時，選民對於在地高雄市的政府各種作為更有切身感受，相較之下，選民對中央政府所作所為的感受顯得較為遙遠。當然，這樣的差異也可能是來自選民政黨認同所致，因為當政黨認同因素與政府施政滿意度同時進入模型分析時，原來滿意中央政府施政表現並且投票支持挑戰者楊秋興的關聯性不再顯著，而滿意高雄市政府施政並支持現任者陳菊的關聯性持續重要。因此，以本研究的發現證實 2014 年的高雄市長選舉當中，高雄市政府對於氣爆事件處理方式的確有利陳菊尋求連任，再者，高雄市政府的施政表現也是促使選民持續支持陳菊的原因，至於政黨認同因素則相當吻合現階段台灣選民在藍綠分野架構下的結果。事實上，本文的關注焦點不在討論政黨因素是否持續在市長選舉中扮演重要角色，而是在接受政黨因素為影響選民投票重要因素的前提下，將更多的篇幅用在討論氣爆事件相關問題與施政滿意度評價的重要性。

在理論的關懷上，本文雖然認同其他研究者對回溯性投票的質疑，但本文的出發點並不是在否定回溯性投票的價值。不可否認的，Achen 與 Bartels 在其共同著作所高舉「選民是短視的」或是「選民的回溯是一種盲目的回溯」的論點是相當具有說服力的，然而，在行為面的觀察與探索上，選民在投票時的確會參考檯面上政治人物的表現，而且其參考結果也會在投票決定中產生作用。因此，在認知到選民的回溯可能是短視與盲目之餘，無可否認，選民短視或盲目的回溯結果仍舊會影響其投票決定。換言之，不論資訊是否充分到可以產生「正確」的評估，選民心中總是對政治人物或政府的表現有一把主觀衡量的尺，當選舉到時，選民心中這把主觀的尺便會產生作用。這一結果自然與古典民主理論所要求的公民政治有所差異，且由於資訊成本問題，公民的實際政治參與

或多或少都會有短視或盲目的部分。換句話說，公民的政治參與都有不同程度的理性與感性的結合。

更為精確地說，氣爆事件與傳統經濟表現的回溯評估與投票研究相較之下，更具有議題投票（issue voting）的意涵，即氣爆事件的發生，以及接下來高雄市政府與中央政府對事件的處理態度，會如何影響四個月之後的市長選舉。對選民來講，氣爆事件提供兩造政府更為即時的表現評估，但即便如此，也不必然就有足夠的資訊對政府表現作正確評估，且電話訪問的限制也無法進一步提供民眾究竟是依據何種標準來進行評估，比較可以確定的是，不論是民眾的資訊性質如何，對於氣爆事件責任與表現評估，總有一些想法，而這些想法也的確影響四個月之後的市長選舉。本文的研究並無法解決回溯評估過程中選民的資訊充分或是正確的問題，選民的評估可能來自客觀資訊，但也可能來自主觀的認知。

在這樣的理解上，本文以高雄市民普遍關注的氣爆事件來檢驗選民在隨之而來的市長選舉之投票決定，同樣也會受到選民是短視與盲目的質疑，這一部分的質疑仍具有正當性，但是，採用氣爆事件作為研究主角，在相當程度上也可以更加確認選民對該事件的熟悉程度，並在選舉中檢驗其重要性，而其結果顯現高雄市民對於氣爆事件的責任歸屬、中央政府與高雄市政府對氣爆的處理評價，的確會影響其市長投票決定。從比較保守的角度來講，這樣的發現仍舊可以說明在特殊事件如果受到普遍注意，具有比較多的正反面資訊可供選民思考，加上離選舉日不遠時，選民仍舊可以相當程度地透過回溯評估的結果來決定其投票對象，因此，在此事件的分析上，如同 Key（1966）經常被引用的說法「選民並非是愚蠢的」（voters are not fools）一樣，高雄市的選民在市長選舉時並非全然不理性。

再者，不同於前述王文誠利用尺度政治解釋陳菊市長如何藉由氣爆事件贏得連任的研究，本文則以選民的認知與態度切入，從調查資料中探索氣爆事件如何影響選民的市長選舉決定。相較之下，王文誠之研究著重氣爆事件主要的

行動者：高雄市政府以及中央政府雙方的鬥爭，而本文則重在另一個行動者：高雄市民及其對整個事件與兩造政府之作爲的看法。這兩個研究途徑雖然在研究焦點與理論應用上有所不同，但最後同樣可以解釋現任市長爲何在遭遇突發事件時仍然可以贏得選舉，在研究突發事件如何影響選舉的文獻相對不足的情況之下，這兩個研究途徑可以是未來研究的參考。

然而，針對突發事件政治效應之研究仍須注意以下可能的限制。首先，不論是採用何種研究途徑，一個比較完整的研究內涵，應該儘量納入突發事件的重要行動者（即事件的利害關係人），因此，高雄市政府、中央政府、高雄市民，甚至是參與災後救災與重建的社會團體等，都是重要的行動者，彼此之間的互動會相互影響，如何更周延地以全面性（holistic）的角度來進行分析是有必要的。其次，突發事件的後續演變需要考慮時間的因素，以本次氣爆事件爲例，從2014年7月31日開始，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民、與中央政府持續針對法律責任的釐清、賠償金額的商討、以及傷者復健、災區重建等重大問題持續有所互動，其過程不僅複雜且冗長，而本文在進行電訪資料蒐集時，卻必須考量不能離開市長選舉的時間太久，因此僅能在選舉之後兩個月內完成調查，但實際上，本事件的政治效應仍舊在持續發酵中，因此，嚴格來講，本文僅能以該事件對市長選舉的影響作有限的分析，不是全盤地對事件的政治效應做討論。

第三，高雄市所具有的地緣特性也值得討論，高雄市在近十年來的政治生態持續是綠大於藍，國民黨本次所推出的候選人楊秋興雖然出身高雄地區，也具有行政首長資歷，但相對個人聲望與陳菊相比則顯得不足，既使有在中央執政的國民黨作爲支援，但仍力有未逮，此一因素值得考量。或者，如果換一個場景：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都屬於同一政黨陣營，則突發事件的政治影響又如何？這一個問題目前難有令人滿意的解答，但可以確認的是，研究2014年高雄市氣爆事件對市長選舉的影響時，個案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例如，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政黨生態、兩造政府對特殊事件的反應差異、事件責任的釐清程度、媒體報導型態、事件發展各階段的民眾感受差異、甚至是直接受災民眾（嚴

重災區的高雄市民）與間接受災民眾（非災區的高雄市民）的感受差異等，都是未來研究特殊事件政治影響時須要特別注意的。^⑧

最後，本文的研究核心，旨在探討單一突發事件是否影響選民之投票選擇，亦即選民「課責」的選舉效果，性質上屬於一個橫斷面（cross-section）的個案研究（case study），以此方式來驗證氣爆事件中所展現之選民課責對投票選擇之影響，仍屬一適當的研究方法。當然，就因果推論的效度而言，實驗設計（experimental design）結合跨時研究（longitudinal study），能夠比橫斷面個案研究，得到更具通則性的因果推論結果。因此，在本文的個案研究基礎上，未來若欲更進一步驗證「課責」對選民投票行為、甚至如何影響民主治理成效的因果關係，可藉由嚴謹實驗設計以及搜尋適當比較案例與調查資料，來進一步建構更具全面性的課責理論。

^⑧ 事實上，氣爆後的一年（2015年），氣爆受難者與市府、李長榮化工等業者已達成和解，並於高雄地方法院完成公證三年時間，且氣爆後三年期間，高雄市政府雖然陸續在七件氣爆國賠的訴訟皆遭敗訴，高雄市政府也將高達 45.6 億多元的善款陸續用於各項重建，並再編列 6.8 億元用於長達 35 年的支持照顧費用。但即便如此，高雄八一氣爆自救會會長陳冠榮，仍在氣爆 3 周年之際投書媒體表示除了求償問題之外，真相仍然未明〔按：其認為該負法律刑責的人仍未負責〕（楊繼宇，2017）。這些後續的發展同樣也會影響高雄市民對整體事件的看法，以及對政府表現的評估。

附錄一 問卷內容以及變數值的編碼方式

變數名稱	問卷內容	編碼方式
被解釋項		
市長投票對象	<p>在這一次高雄市長選舉中（去年 11 月 29 日），請問你把票投給那位候選人？</p> <p>1 楊秋興 2 陳菊 3 周可盛 92 無投票權 93 沒去投 94 投廢票 99 無反應</p>	迴歸分析時，選項 1 重新編碼成 0；選項 2 重新編碼為 1；其餘選項重新編碼成系統遺漏值。
解釋項		
氣爆事件注意程度	<p>在去年 7 月底發生氣爆（臺：爆炸）之後，請問您對這件事情的後續發展（臺：後來的發展）不注意（臺：咁唔注意）？【訪員追問強弱度】</p> <p>1 非常注意 2 有點注意 3 不太注意 4 非常不注意 9 無反應</p>	
氣爆責任歸屬	<p>請問您認為這次氣爆（臺：爆炸）的發生，是中央政府還是高雄市政府應該負比較大的責任？【訪員追問強弱度】</p> <p>1 中央政府負全部的責任 2 中央政府負大部分責任 3 高雄市政府負大部分責任 4 高雄市政府負全部的責任 5 一半一半 6 都有 7 李長榮公司（業者） 8 吳敦義前高雄市 9 以前的中央政府 10 以前的高雄市政府 99 無反應</p>	迴歸分析時，選項 1、2、8、9、10 重新歸併為「責任歸屬中央」，編碼成 0；選項 3、4 重新歸併為「責任歸屬地方」，編碼為 1；其餘選項重新編碼成系統遺漏值。

附錄一 問卷內容以及變數值的編碼方式（續）

變數名稱	問卷內容	編碼方式
高雄市政府處理氣爆滿意度	<p>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高雄市政府處理氣爆（臺：爆炸）的表現滿不滿意（臺：咁唔滿意）？【訪員追問強弱度】</p> <p>1 非常滿意 2 有點滿意 3 不太滿意 4 非常不滿意 9 無反應</p>	迴歸分析時，選項 1、2 重新歸併為「滿意市政府處理」，編碼成 1；選項 3、4 重新歸併為「不滿意市政府處理」，編碼為 0；其餘選項重新編碼成系統遺漏值。
中央政府處理氣爆滿意度	<p>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中央政府處理氣爆（臺：爆炸）的表現滿不滿意（臺：咁唔滿意）？【訪員追問強弱度】</p> <p>1 非常滿意 2 有點滿意 3 不太滿意 4 非常不滿意 9 無反應</p>	迴歸分析時，選項 1、2 重新歸併為「滿意中央政府處理」，編碼成 1；選項 3、4 重新歸併為「不滿意中央政府處理」，編碼為 0；其餘選項重新編碼成系統遺漏值。
中央政府施政滿意度	<p>請問您對國民黨執政的中央政府，過去一年來的整體表現滿不滿意（臺：咁唔滿意）？【訪員追問強弱度】</p> <p>1 非常滿意 2 有點滿意 3 不太滿意 4 非常不滿意 9 無反應</p>	迴歸分析時，選項 1、2 重新歸併為「滿意中央政府施政」，編碼成 1；選項 3、4 重新歸併為「不滿意中央政府施政」，編碼為 0；其餘選項重新編碼成系統遺漏值。
陳菊市長施政滿意度	<p>請問您對陳菊擔任（臺：做）市長以來的整體表現滿不滿意（臺：咁唔滿意）？【訪員追問強弱度】</p> <p>1 非常滿意 2 有點滿意 3 不太滿意 4 非常不滿意 9 無反應</p>	迴歸分析時，選項 1、2 重新歸併為「滿意陳菊市長施政」，編碼成 1；選項 3、4 重新歸併為「不滿意陳菊市長施政」，編碼為 0；其餘選項重新編碼成系統遺漏值。

資料來源：游清鑫（2015）。

附錄二 主要變數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由於在交互作用模型中，不能直接解釋自變數的係數，本文提供邊際效果作為解釋依據。模型四是模型三加上「氣爆責任歸地方」和「滿意市府處理」的交互作用項。模型四的結果顯示，當選民不滿意市府對氣爆的處理時，「氣爆責任歸地方」對投票給陳菊的(95%CI)邊際效果為(-3.428, 0.499)；當選民滿意市府對氣爆的處理時，「氣爆責任歸地方」對投票給陳菊的(95%CI)邊際效果為(-6.277, 1.396)。此結果意謂選民對責任歸屬的認知，對其投票行為的影響並不會因選民是否滿意高雄市政府對氣爆事件的處理而有所差異。

模型五是延續原有模型三加上「氣爆責任歸地方」和「滿意中央處理」的交互作用項。模型四的結果顯示，當選民不滿意中央對氣爆的處理時，「氣爆責任歸地方」對投票給陳菊的(95%CI)邊際效果為(-3.383, -0.860)；當選民滿意中央對氣爆的處理時，「氣爆責任歸地方」對投票給陳菊的(95%CI)邊際效果為(-5.092, 0.588)。此結果意謂選民對責任歸屬的認知，對其投票行為的影響部份受到選民是否滿意中央政府處理氣爆事件而有所差異。換句話說，民眾對地方政府的「課責」會因為不滿意中央政府處理氣爆事件，而降低其投票給陳菊的可能性。然而，此影響效果卻不存在於滿意中央政府處理氣爆事件的情況。

綜合模型三、模型四與模型五的結果，本文作者認為本文主要的自變數「氣爆責任歸地方」是直接影響依變數，此結果與本文的理論一致，即選民對於責任歸屬的認知是會影響其投票決定的，而此影響效果並不會因為其是否滿意地方或中央政府處理氣爆事件而有所差異。

	模型四 責任歸屬、處理評價、施政滿意度、交互作用項與其他基本變數			模型五 責任歸屬、處理評價、施政滿意度、交互作用項與其他基本變數		
	B	S.E.	Exp (B)	B	S.E.	Exp (B)
截距	2.984*	1.600	19.763	3.418**	1.537	30.506
氣爆責任歸地方	-1.465	1.002	.231	-2.122***	.644	.120
滿意市府處理	3.864***	1.183	47.660	3.088***	.707	21.923
滿意中央處理	-.975*	.582	.377	-.889	1.093	.411
滿意中央施政	.130	.832	1.139	.146	.841	1.157
滿意市長施政	2.395***	.651	10.966	2.443***	.655	11.502
泛藍政黨認同者	-5.209***	.781	.005	-5.172***	.773	.006
中立者	-1.561**	.656	.210	-1.577**	.661	.207
男性	-.300	.465	.741	-.350	.467	.705
30-39 歲	-.591	.726	.554	-.595	.725	.551
40-49 歲	-.478	.783	.620	-.479	.784	.619
50-59 歲	-2.18**	.968	.109	-2.145**	.948	.117
60 歲及以上	-1.549	1.152	.212	-1.601	1.144	.202
國、初中	-2.889**	1.279	.056	-2.680**	1.250	.069
高中、職	-.062	1.033	.940	.018	1.039	1.019
專科	.365	1.228	1.440	.452	1.235	1.571
大學及以上	-1.793	1.189	.167	-1.727	1.118	.178
氣爆責任歸地方 * 滿意市府處理	-.976	1.198	.377			
氣爆責任歸地方 * 滿意中央處理				-.130	1.176	.878
N		564			564	
Cox & Snell R ²		0.447			0.446	
Nagelkerke R ²		0.786			0.785	

資料來源：游清鑫（2015）。

說明：***: $p < 0.01$; **: $p < 0.05$; *: $p < 0.1$ 。

參考書目

- 王文誠(2016)。〈災難治政—2014年高雄石化氣爆後的尺度政治與不均地理發展〉，《政治學報》，第61期，頁87-113。
- (Wen-cheng Wang [2016]. “Disaster Politics: Politics of Scale and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after the 2014 Kaohsiung Petrochemical Explosion.”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 61:87-113.)
- 自由時報(2014)。〈高雄災後重建，江揆「三不」冷回應〉，《自由時報》。<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801899>。2017/8/10。
- (Liberty Times [2014]. “Post-Disaster Rebuilding of Kaohsiung, the Premier Cold Responds ‘Three Nos’.” *Liberty Times*.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801899> [assessed August 10, 2017].)
- 吳重禮、李世宏(2003)。〈總統施政表現對於國會選舉影響之初探—以2001年立法委員選舉為例〉，《理論與政策》，第17卷，第1期，頁27-52。
- (Chung-li Wu and Shih-hung Lee [2003]. “The Pilot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Presidential Performance upon Congressional Election: The Cast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Election in 2001.” *Theory and Policy*, Vol. 17, No. 1:27-52.)
- _____ (2004)。〈政府施政表現與選民投票行為—以2002年北高市長選舉為例〉，《理論與政策》，第17卷，第4期，頁1-24。
- (_____ [2004].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Voting Behavior: Lessons of the 2002 Taipei and Kaohsiung Mayoral Elections.” *Theory and Policy*, Vol. 17, No. 4:1-24.)
- 林伯驊(2018)。〈高雄氣爆歷時3年開庭，一審預定5月11日宣判〉，《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7321/2907744>。2018/3/13。
- (Bo-hua Lin [2018]. “Three Years after the Gas Blast of Kaohsiung, the Conviction Will Be Announced on May 11.” *udn.com*. <https://udn.com/news/story/7321/2907744> [assessed March 3, 2018].)
- 俞振華(2012)。〈探討總統施政評價如何影響地方選舉—以2009年縣市長選舉為例〉，《選舉研究》，第19卷，第1期，頁69-95。
- (Eric Chen-hua Yu [2012]. “The Impact of President’s Performance on Taiwan’s Local Elections: Analyzing the 2009 Magistrate Elections.”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Vol. 19, No. 1:69-95)
- 張佑宗(2009)。〈搜尋台灣民粹式民主的群眾基礎〉，《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5期，頁85-113。
- (Yu-tzung Chang [2009]. “The Mass Bases of Populist Democracy in Taiwan.”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75:85-113.)
- 張傳賢、張佑宗(2006)。〈選舉課責—拉丁美洲國家政府施政表現與選舉得票相關性的研究〉，《台灣政治學刊》，第10卷，第2期，頁101-47。

- (Chang, Alex Chuan-Hsien and Yu-tzung Chang [2006].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The Relation between Incumbent Governments'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Vote Shares in Latina America." *Taiw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 No. 2:101-47.)
- 黃秀端 (1994)。〈經濟情況與選民投票抉擇〉，《東吳政治學報》，第3期，頁97-123。
- (Shiow-duan Hawang [1994]. "Economic Situation and Voting Decision."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No. 3:97-123.)
- 游清鑫 (2015)。《政治課責—制度設計、選民資訊與投票行為》(科技部研究計畫(3/3) NSC 102-2410-H-004-131-MY3)。臺北：行政院科技部。
- (Ching-hsin Yu [2015].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Institutional Design, Voter's Information and Voting Behavior*. Research Project of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3] NSC 102-2410-H-004-131-MY3, Taipei: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游清鑫、林長志 (2014)。〈「政治課責」研究文獻的評析—兼論臺灣個體資料的測量與運用〉，「2014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當前全球民主實踐的再思考—困境、挑戰與突破」論文。臺北：臺灣大學，12月6-7日。
- (Ching-hsin Yu and Chang-chih Lin [2014]. "Reviewing the Study of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the Micro Measurement and Application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4 Annual Meeting and Conference of Taiw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the Reconsideration of the Practice of Global Democracy: Difficulties, Challenges and Breakthroughs.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ecember 6 to 7.)
- 楊繼宇 (2017)。〈要一個高雄氣爆的真相，沒有妥協與退讓〉，NOWnews。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70805/2596613。2017/9/23。
- (Jih-yu Yang [2017]. "Demanding A Truth of Gas Blast of Kaohsiung, No Compromises and Yields." *NOWnews*.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70805/2596613 [assessed September 23, 2017].)
- 遠見編輯部 (2015)。〈縣市長施政滿意度，新科首長交出好成績〉，《2015 遠見縣市長施政滿意度調查》。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28831。2017/8/10。
- (Global View Monthly [2015]. "Approval Rating of County Magistrates and City Mayors, New Executive Heads Earns Good Scores." *Approval Rating of County Magistrates and City Mayors in 2015*.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28831 [assessed August 10, 2017].)
- 維基百科 (2018)。〈2014年高雄氣爆事故〉。https://zh.wikipedia.org/zh-tw/2014年高雄氣爆事故。2018/3/13。
- (Wikipedia [2018]. "Gas Blast Incident of Kaohsiung in 2014." https://zh.wikipedia.org/zh-tw/2014年高雄氣爆事故 [assessed March 13, 2018].)
- 蔡宗漢、游清鑫 (2016)。〈台灣民眾的課責觀—理論與測量〉，「2016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民主的挑戰與深化—台灣新政局的契機」論文。臺北：世新大學，10月22-23日。

- (Tsung-han Tsai and Ching-hsin Yu [2016]. "Governm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in Taiwan: Theory and Measure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6 Annual Meeting and Conference of Taiw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Challenges and Deepings of Democracy: Opportunities for Taiwan's New Political Era. Taipei: Shih-shin University, October 22 to 23.)
- 蕭怡靖 (2013)。〈台灣民眾政治課責觀之初探—認知、評價與影響〉，《臺灣民主季刊》，第 10 卷，第 2 期，頁 1-23。
- (Yi-ching Hsiao [2013]. "The Perception, Evaluation and Impact of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in Taiwan."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Vol. 10, No. 2:1-23.)
- 蕭怡靖、黃紀 (2011)。〈施政表現在不同層級地方選舉中的影響—2009 年雲林縣縣長及鄉鎮市長選舉之分析〉，《選舉研究》，第 18 卷，第 2 期，頁 59-86。
- (Yi-ching Hsiao and Chi Huang [2011].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Voter Choice in Local Elections: The Case of 2009 Yunlin County and Township Magistrates Elections."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Vol. 18, No. 2:59-86.)
- 蕭怡靖、游清鑫 (2008)。〈施政表現與投票抉擇的南北差異—2006 年北高市長選舉的探討〉，《臺灣民主季刊》，第 5 卷，第 2 期，頁 1-25。
- (Yi-ching Hsiao and Ching-hsin Yu [2008]. "Administrative Performance and Voter Choic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2006 Taipei and Kaohsiung Mayoral Elections."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Vol. 5, No. 2:1-25.)
- 蘋果日報 (2014)。〈天佑高雄氣爆 26 死 285 傷〉，<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140802/35996434>。2018/3/13。
- (Apply Daily [2014]. "26 Deaths and 285 Injured, God Bless the Gas Blast of Kaohsiung."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140802/35996434> [assessed March 13, 2018].)
- Achen, Christopher and Larry Bartels (2016). *Democracy for Realists: Why Elections Do Not Produce Responsive Government*.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erry, William D., Jacqueline H. R. DeMeritt, and Justin Esarey (2010). "Testing for Interaction in Binary Logit and Probit Models: Is a Product Term Essentia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4, No. 1:248-66.
- Cheibub, José Antonio and Adam Przeworski (1999). "Democracy, Elections, and Accountability for Economic Outcomes." In Adam Przeworski, Susan Stokes, and Bernard Manin (eds.), *Democracy, Accountability, and Representation* (pp. 222-5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erejohn, John (1986). "Incumbent Performance and Electoral Control." *Public Choice*, Vol. 50, No. 1:5-25.
- _____. (1999). "Accountability and Authority: Toward a Theory of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In Adam Przeworski, Susan Stokes, and Bernard Manin (eds.), *Democracy, Accountability, and Representation* (pp. 131-5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ilmard, Sean (2014). "Accountability and Principal-Agent Theory." In Mark Bovens, Robert E. Goodin, and Thomas Schillemans (eds.), *Oxford Handbook of Public Accountability* (pp. 90-10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rmley, William T. Jr. and Steven J. Balla (2004). *Bureaucracy and Democracy: Accountability and Performance*. Washington, D.C.: CQ Press.
- Grant, Ruth W. and Robert O. Keohane (2005). "Accountability and Abuses of Power in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9, No. 1:29-43.
- Hellwig, Timothy and David Samuels (2008).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and the Variety of Democratic Regim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8, No. 1:65-90.
- Kayser, Mark Andreas and Michael Peress (2012). "Benchmarking Across Borders: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and Necessity of Comparis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6, No. 3:661-84.
- Key, Vernon O. (1966). *The Responsible Electorat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Kiewiet, D. Roderick and Douglas Rivers (1984). "A Retrospective on Retrospective Voting." *Political Behavior*, Vol. 6, No. 4:369-93
- Kramer, Gerald (1971). "Short-term Fluctuations in US Voting Behavior, 1896-1964."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5, No. 1:131-43.
- Kuklinski, James and Darrell West (1981). "Economic Expectations and Voting Behavior in United States Senate and House Elec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5, No. 2:436-47.
- Lanoue, David (1994).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Voting in Presidential-Year Election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47, No. 1:193-205.
- Lewis-Beck, Michael (1988). *Economics and Election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_____. (1997). "Who's the Chef? Economic Voting under a Dual Execu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31, No. 3:315-25.
- Lockerbie, Brad (1992). "Prospective Voting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1956-88."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Vol. 20, No. 3:275-300.
- Mainwaring, Scott and Christopher Welna (eds.) (2003).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nin, Benard, Adam Przeworski, and Susan C. Stokes (1999). "Elections and Representation." In Adam Przeworski, Susan C. Stokes and Benard Manin (eds.), *Democracy, Accountability, and Representation* (pp. 1-2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nardi, Fred (1994). "Primary Voters as Retrospective Voters."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Vol. 22, No. 1:88-103.
- O'Donnell, Guillermo (2003). "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The Legal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istrust." In Scott Mainwaring and Christopher Welna (eds.),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in Latin America* (pp. 34-5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edler, Andreas (1999). "Conceptualizing Accountability." In Andreas Schedler,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The Self-Restraining State: Power and Accountability in New Democracies* (pp. 13-28).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Schmitter, Philippe C. (2004).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The Ambiguous Virtues of Accountabilit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4:47-60.
- Scott, Colin (2000). "Accountability in the Regulatory State."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Vol. 27, No. 1:38-60.
- Shaffers, Stephen and George Chressantis (1991). "Accountability and U.S. Senate Elections: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44, No. 3:625-39.
- Svoboda, Craig (1995). "Retrospective Voting in Gubernatorial Elections: 1982 and 1986."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48, No. 1:135-50.
- Tsai, Tsung-han and Jeff Gill (2013). "Interactions in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 Theoretical Issues and an Application to Personal Vote-Earning Attributes." *Social Sciences*, Vol. 54, No.1:248-66.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and Voting Behavior: A Case Study of Gas Blast of Kaohsiung City in 2014

Ching-hsin Yu, Tsung-han Tsai and Chang-chih Lin

Abstract

“Throwing the rascal out” is one of the bedrock principles in modern democracy. The idea of “accountability” is thus realized by replacing under-performed politicians by qualified ones. However, it is often found that citizen fails to identify the real “rascal” as well as non-performance issues carries more weight in citizen’s voting choices in election. In Taiwan, the demand for accountable governance is even more pressing as Taiwan has entered a new phrase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vent of gas blast in Kaohsiung City in 2014 as a case study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and voter’s choice in the year end election for city mayor. Special attention is paid to citizen’s perception of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of the event and how the perception affects citizen’s vote choice in mayoral election. Based on the analyses of post-election survey,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conventional factors such as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approval rating, citizen’s perception of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and evaluation of government’s responses toward the event also play significant roles in election. It also shows that, comparing to the long term psychological or ambiguous approval factors, the gas blast event as a case study of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is more able to examine the electoral impact of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In the last part of this paper, a brief concluding remarks and the suggestions of studying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in Taiwan will be provided.

Keywords: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voting behavior, government performance, gas blast, mayoral election of Kaohsiung City in 2014.

Ching-hsin Yu is a research fellow in the Election Study Center and Taiwan Institute for Governance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omparative politic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parties and electio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democratization theor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ology.

Tsung-han Tsai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a research fellow in the Taiwan Institute for Governance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omparative politics, political economy, and political methodology.

Chang-chih Lin is an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i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focus on comparative politics, electoral systems and party politics, voting behavior, and survey research.

